

壹、前言

立憲主義的德文是 Konstitutionalismus，法文是 constitutionnalisme，乃是基於憲法運作政治的原理。十七世紀的英國光榮革命後，確立為國家政治的基本原理，其後在十九世紀，更進一步成為貫穿歐洲各國憲法典的原理。其具體內容為權力分立⁽²⁾、基本人權的保障與法治主義等等。換言之，現代國家廣泛地承認法治主義，特別是將憲法定位為國家的基本法或最高法規。因此，應基於憲法實施國家政治的本身即是法治主義，站在實施國家政治的立場者，有承擔尊重與擁護憲法的義務，就法治主義原則而言，此乃理所當然的結論。在中古世紀，即有所謂的「責任原則」；亦即，「政府的設立是為著擁護法，若不遵守法，則喪失其本身的權限」。此外，現代國家中，各國普遍採取民主政治，國家政治乃是對國民的人權給予最大限度的保障，因此憲法上皆會規定人權的尊重⁽³⁾。例如在憲法中一般規定，國民主權與代表民主制外，即是基本人權的享有與個人的尊重。

就廣義而言，人權若理解為對人類解放的一般性要求時，則當然可視為在歷史的各個階段，人權皆普遍性的存在。本研究與此種的一般性見解不同，「基本人權」此用語在嚴格的意涵下理解為具備近代憲法所保障的特殊結構下關於人的權利。因此，近代立憲主義型態的人權與社會主義型態的人權互異。近代憲法藉由「針對國家權力」的法規範之制約以保障人權。

然而，社會主義憲法的終極目的則在於藉由階級支配的工具即國家權力的解體，進行對人類全面性的解放，而在其過渡階段期間，採取因應各國的各項條件與發展階段的複雜型態⁽⁴⁾。同時，在社會主義革命方面，各國的歷史經驗即有相當大程度的不同；例如，俄羅斯的社會主義革命係經由資本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成長轉化而成；東歐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乃在人民民主主義體制下由全體人民反法西斯主義運動及民族解放運動的成長轉化而成；亞洲社會主義各國則是在針對外國帝國主義殖民地支配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的連續發展而達成⁽⁵⁾。

然而，就歷史的經驗而言，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勢必產生出以下的重大矛盾點。第一，無產階級（專政）權力，所要處理的問題不僅是社會型態的重組，其主要的課題大多是創設出社會主義下各種物質前提的本身，例如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課題，此勢必會影響到社會主義下生產所有的管理型態。亦即，管理機構的過度集中化下，導致伴隨著出現

管理者集團與直接生產者間的矛盾複雜化的問題；第二，關於生產手段私人所有制度的廢除，雖限定在資本主義型態的私人所有，在一定的期間內保留廣大的小商品生產者的私人所有，但當無產階級（專政）權力對此欲加以改造同時有勢必加以利用時，無產階級（專政）權力勢必與身為小商品生產者的農民間產生不可避免的矛盾；第三，在上述的條件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計劃型及意識形態型的經濟關係組織勢必受到市場關係的制約，因而此兩者間必然存在矛盾；第四，無產階級（專政）權力所要面臨的課題不僅是經濟的後進性，甚至是上層政治結構中遺留的封建時代官僚主義殘渣等⁽⁶⁾的矛盾。

因此，由過去的歷史經驗得知，為求將上述的各種矛盾加以解決，若將人權理解為是在特定歷史社會下規定在資本主義社會全體存在結構中，一種擁有特殊理論結構的意識形態時，社會主義革命即使高唱人權擁護作為其政治口號，就其社會理論而言，勢必要否定歷史範疇中的人權⁽⁷⁾。乃因藉由對此種人權範疇的否定，社會主義革命所欲實現的人類解放正是與此種的人權範疇息息相關。職是之故，目前唯一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體制，在標榜人權保障的同時，勢必要否定其自身的憲法人權規定，若非如此，則無法實施其社會主義體制的運作與實現社會主義的建設。

本研究即基於此一觀點與前述的立憲主義的立場，檢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政體制的形成與發展(第一章)，其中區分為一九八二年憲法以前的體制形成與發展（第一節），與現行的一九八二年憲法體制（第二節）；並論述實現社會主義人權規定的前提即「人民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權力」（第二章），分別是「人民民主專政與人民基本權」（第一節）與「無產階級權力與公民基本權」（第二節）；再者，藉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人權規定的陳述與實況的論證（第三章），突顯出實況無法滿足憲法的規定，係基於歷史經驗有其必然性；最後指出三點的論述作為本研究的結語。

貳、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政體制的形成與發展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政體制的形成與發展方面，可區分為以下兩方面；亦即，現行的一九八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政體制之前，有一九四九年的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一九五四年的憲法、一九七五年憲法與一九七八年憲法，其後再針對現行的一九八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政體制加以論述⁽⁸⁾。首先，針對現行的一九八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

政體制之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形成與發展加以敘述。

一、一九八二年憲法以前的體制形成與發展

（一）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

一九四九年一月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六月十五日即在北平召開關於建政綱領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九月十七日該籌備會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將新政治協商會議改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共同綱領草案」等其他三個草案⁽⁹⁾；九月二十一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與會總人數為六六二名，採取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組織型態；九月二十七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年號、國歌、國旗之決議」，並於其後兩天的二十九日通過具備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會議的最後一天的三十日選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全國委員會與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委員；毛澤東被選任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主席，該年十月一日，站在北京天安門的樓台上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央人民政府。

共同綱領的基本性質，主要是樹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此一新的國家權力所集結的統一戰線，基本上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政策綱領。內容有關於新國家的性質、國家制度與基本經濟制度的基本原則、人民的權利、義務等等，一般而言已具備作為國家根本大法憲法的內容與形式。其第一條⁽¹⁰⁾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乃是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由工人階級指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促成民主各層階級與國內各民族團結，進行人民民主專政⁽¹¹⁾。第三條規定所謂的農民土地所有制，沒收當時接受美國援助的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果夫與陳立夫「四大家族」的官僚資本，將其歸於屬於人民的國家所有。

（二）一九五四年的憲法

隨著一九五〇年國內軍事行動的終止，該年六月爆發的韓戰亦於一九五三年七月結束，成立停戰協定；一九五〇年六月至一九五二年底進行所謂的土地改革、反革命鎮壓運動、三反・五反運動等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作為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經過三年後，其階段性的任務亦已告終。一九五三年中央人民政府開始

提出所謂的「過渡時期總路線」，進行第一次的五年計劃⁽¹²⁾，其主要內容即是同時推動社會主義的革命與建設，此一方針貫穿整個一九五四年的憲法。

一九五四年憲法的制定過程是，一九五三年一月當時作為臨時最高權力機關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決定設置以毛澤東為委員長的「憲法起草委員會」。該委員會即以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憲法草案初稿為基礎，進行起草作業；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公佈應當交付全國人民討論的「憲法草案」，經過大約兩個月左右展開的全國人民討論，共有約一億五千萬人參與討論，並提出約有一百萬個修正案與補充意見，該草案在經過進一步的修正後，該年九月二十日由體現人民主權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最終草案進行審議，並表決通過中國最早的社會主義型態憲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一九五四年憲法乃由前文與總綱、國家機構、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國旗・國徽・首都，共四章一〇六條構成。此部憲法除繼承前述共同綱領的歷史經驗外，並參酌舊蘇聯與其他先成立的人民民主主義國家的憲法。值得一提的是，此部憲法的前三章雖是以舊蘇聯一九三六年的憲法為範本，但並非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憲法，仍是屬於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特殊歷史階段憲法。此外，一九五四年憲法將生產手段的所有型態，區分為以下四種：第一是國家所有，即全體人民所有；第二是社會共同組織所有，即工人大眾所有；第三是獨自經營的工人所有；第四是資本家所有（第五條）。而後兩者則是社會主義的改造對象（第七條到第十條）。要言之，一九五四年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性質為，中國藉由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邁入由資本主義朝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時期，以及再度確認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以來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型態，即由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指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

一九五四年憲法制定目標之一的生產手段所有的社會化，在一九五六年階段，基本上已達成⁽¹³⁾。中共第八全大會基於此項事實，提出「法制」的遵守與法典化的方針；然而，因一九五七年進行所謂的反右派鬥爭，所謂的「法制」遵守被迫放棄。儘管如此，繼生產手段所有社會化後的下一個階段的「社會主義全面建設」，則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第八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作成「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決議。爰此，其後是一九六〇年代一連串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緊接其後的即發生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¹⁴⁾。總之，一九五四年憲法的實效性與規範性，隨著上述一連串的運動與革命行動的展開可說喪失殆盡，所謂的「社會主義式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法制」等的憲法原則早已完全名存實亡。

（三）一九七五年憲法

為求因應此種無憲法秩序的文革狀態，十年後的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形式上對一九五四年憲法，作全面性的修改，並表決通過此一第二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一九七五年憲法。此部憲法與一九五四年憲法同樣是由前文與四章構成，全部的條文壓縮成僅剩三十個條文。值得注意的是，一九八〇年代在中國的憲法學界對此部憲法的評價⁽¹⁵⁾，幾乎是全面性地給予負面的評價。其理由在於此部憲法的誕生完全是在政治力的左右下，憲法內容赤裸裸地表現出完全的政治性。此點由當時接受中共委託擔任修憲報告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張春橋的發言即可知；亦即，第一是社會主義必須經過相當長期的歷史階段，在此階段國內一直存在階級與階級的矛盾與鬥爭的同時，亦存在著對國外敵人的矛盾，唯有繼續無產階級專政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才能加以解決；第二是全體中國人民為要達成社會主義完全的歷史階段，即更高層次的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必須堅持中共的基本路線與政策，以及堅持繼續無產階級專政革命。上述兩者乃是「本次修憲的主要任務」與「修憲時的指導思想」，亦是支撐文化大革命的意識形態。因此，一九七五年憲法又被稱為是「文革憲法」。

此部憲法在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乃是由工人階級所指導的勞農聯盟，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顯示出國家的性質；至於生產手段的所有上，主要是區分為全體人民所有與共同團體組織所有兩種；而此部憲法最大的特徵在於，不斷地重複與強調中共的指導性地位與角色。例如，「中國共產黨是全體中國人民的指導核心。工人階級透過做其前衛的中國共產黨，實現對國家的指導」（第二條）；對國家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指導（第十三條與第十六條）；對軍事武力的指導（第十五條）；對國務院總理與其他成員任免的提議（第十七條）；公民對黨指導的擁護義務（第二十六條）。一言以蔽之，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優越於國家，重視政治階級鬥爭勝於法秩序，黨的政策優先於法規範，諷刺的是

黨的政策決定甚至可隨時廢棄此部憲法。因此，一九七五年憲法完全不具備憲法應有的實效性，三年後即告壽終正寢。

（四）一九七八年憲法

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表決通過第三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又被稱為「一九七八年憲法」。此部憲法正式承認的經過與背景，係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後，於該年十月「四人幫」遭受逮捕後的新佈局下，而後在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的十一全大會上宣示的「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終結」宣言⁽¹⁶⁾，則是制定此部憲法的政治背景。一九七八年憲法雖標榜脫離文化大革命與強化「民主與法制」，但仍未能跳脫一九七五年憲法的窠臼。此外，此部憲法的修正與制定的過程，亦存在相當嚴重的憲法手續問題。亦即，並未經由與適用一九七五年憲法第十七條規定，即修憲問題必須由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決，自草案到確定始終是由中國共產黨的黨中央主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未實質參與制定過程，意味著所謂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事實上根本未發揮任何的機能。尤有甚者，審議與表決通過最終草案而召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構成本身，並未經過實質的選舉而是由黨中央的指定，存在非常嚴重的憲法手續的問題。

此部憲法與前兩個憲法相同，由前文與四章共六十個條文構成。其前文除後段的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外，幾乎完全繼承一九七五年憲法的前文；同時，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性、國家性質與生產手段的所有型態上，亦是繼承一九七五年憲法。此部憲法其後由於中共內部關於領導權的政治鬥爭，期間經歷過兩次的部分修正，並在兩年後的一九八〇年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決定全面修改此部憲法⁽¹⁷⁾。

二、現行的一九八二年憲法

現行的一九八二年憲法係基於中共中央的提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決議全面修正一九七八年憲法與設置憲法修正委員會，並於一九八二年四月該屆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上，公佈「修正草案」，交付全體人民討論，經過四個月，憲法修正委員會即根據此一討論結果，於該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確定「最終草案」，並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於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上

表決通過。基本上，此部新憲法的內容，完全是根據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關於建國以來黨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與在翌年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共十二全大會中所做的各項決定。

此部憲法乃由前文、第一章「總綱」、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第三章「國家機構」、第四章「國旗、國徽、首都」構成，全文共一三八條。此部憲法與前三部憲法在章的編排上有所不同，將「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的規定置於「總綱」之後，但在「國家機構」與「國旗、國徽、首都」等其他條文的前面。根據中共官方的說法，其理由在於，在草案的階段即已確認市民在國家生活中的地位，重視市民的民主權利之保障，並參酌世界各國的憲法，特別是一九七〇年代制定「新憲法」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憲法模式⁽¹⁸⁾。誠然，一九八二年憲法在「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此章的條文數上，確有增加。例如，重新納入一九五四年中曾存在，一九七五年與一九七八年憲法中卻被刪除的「法之前的平等」條文，不得不承認其似乎採取較為「重視」的態度。

關於一九八二年憲法中規定的國家性質方面，則有以下問題。亦即，其前文中指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而其第一條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既然前文明文指出國家權力的階級性本質，即「無產階級專政」，為何第一條卻用「社會主義國家」，而不直接規定出「無產階級專政」？附帶一提的是，在一九七五年與一九七八年的憲法中，皆明白規定「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關於此點，可由以下兩個論點加以確認。

第一是在一九七八年憲法時期，於一九七九年七月制定的刑法與刑事訴訟法中，皆是用「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相同的用法亦出現在前述的「關於建國以來黨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此外，在一九八二年憲法前文中指出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三月最早提出，在當時鄧小平將其中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以「無產階級專政」取而代之⁽¹⁹⁾。其後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鄧小平又指出，「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²⁰⁾，在此次鄧小平的談話中，亦談及「人民民主專政的使用方式較適合我國國情」⁽²¹⁾。

第二是將一九七八年憲法的「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案，據稱

雖是在決議修正此部憲法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做出，但在公佈的修正草案前文中，則仍是「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²²⁾。至於表決通過的憲法前文，如前所述，只不過是在「即」前頭加上「實質上」的字眼而已。

至於為何將「無產階級專政」改為「人民民主專政」的理由，在修憲報告中，並無具體的說明⁽²³⁾。

一九八二年憲法中所提示今後國家的基本任務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即除在鄧小平的指導體制下，進行前述的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外，保證將此一任務加以實現的即是，在憲法前文中指出，所謂的「四大堅持」的指導思想；亦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²⁴⁾。一九八二年憲法與前兩個憲法，即一九七五年與一九七八年憲法中不斷地重複強調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性相比，有某種程度的節制。然而仍須特別注意的是，在一九八二年整體憲法的評價上，「四大堅持」特別是作為核心的「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將遠遠超過任何現實上的國家生活中的憲法或法規範，而佔有最核心的地位。

一九八二年憲法為求反映出一九七九年以後的「經濟改革」，一九八八年四月，在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做出部分的修正。其主要的修正內容是土地使用權的讓渡（第十條）與承認「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的存在與發展（第十一條）。此外，一九九九年的修憲，亦將鄧小平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納入憲法的前文中。

再者，為求較易實現「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目標，一九八二年憲法規定出以下的內容。第一是所有權雖屬於全體人民擁有，但承認各個勞動者所有權的存在（第六條至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以及「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第十三條）；此外，亦保護「外國的企業」、「經濟組織」與「個人的合法的權利」（第十八條）；第二是「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第十五條），並且「國營企業有經營管理的自主權」（第十六條），「集體經濟組織有獨立進行經濟活動的自主權」；第三是在實現經濟政治改革的同時，獎勵教育與文化的各種活動（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三條），強力倡導所謂的「精神文明」（第二十四條）⁽²⁵⁾。

然而須特別注意的是，第一是儘管承認各個勞動者所有權的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仍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第六條），而國營經濟亦仍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第七條），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其他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仍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城鎮中的手工業、工業、建築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第八條），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僅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第十一條），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才是神聖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佔或者破壞此一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第十二條）；第二是唯有在服從國家的統一領導和全面完成國家計劃，與接受國家計劃指導和遵守有關法律的前提下，國營企業及集體經濟組織，才享有經營管理的自主權與經濟活動的自主權（第十六條與第十七條）；第三只有國家才能發展社會主義的教育事業、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事業、醫療衛生事業與體育事業、現代醫藥和中國傳統醫藥、發展，鼓勵和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文學藝術事業、新聞廣播電視事業、出版發行事業、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和其他文化事業（第十九條到第二十三條），最後是國家透過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紀律和法制教育，透過在城鄉不同範圍的群眾中制定和執行各種守則、公約、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國家提倡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公德，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第二十四條）⁽²⁶⁾。要言之，在中國共產黨支配、主導與解釋現行憲法的獨裁專政的憲法體制下，一切的以國家或全體人民為名的所有權、經濟活動、國營事業、集體經濟組織、教育等一切其他的事業與精神文明的內涵，皆由中國共產黨一黨決定。

同時，一九八二年憲法為求因應一九九七年香港自英國的回收，特別在第三十一條中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今日承認香港繼續資本主義體制的「一國兩制」政策，即是以此條文為基礎。然而必須特別注意的是，在此所謂的「特別行政區」與「一國兩制」皆是由中國片面即可加以決定，無須獲得香港住民或其代表的同意⁽²⁷⁾。再者，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國與英國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²⁸⁾』，與根據一九九〇年四月四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六號制定，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實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²⁹⁾第五條中，皆載明中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亦即，根據「一國兩制」原則，香港特別行政區不會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與政策，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與生活方式，保持五十年不變。然而，上述的中英聯合聲明中並未規定不得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禁止規定，因此無人能保證香港確確實實能享有五十年不變，例如即有學者指出，「我國乃是單一制的國家，不必然有必要一一列舉出各個行政區域單位。特別是在我國國內的各行政區域的區分，將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發展，存在著新變動的可能性，不可能完全固定⁽³⁰⁾」；此點亦可由前述一九八二年憲法第三十一條中的「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亦經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則完全由中國共產黨一黨控制加以驗證。因此，當前最重大與嚴重的問題是，如何基於現行統制香港行政的各項規定與香港過去在英國殖民下的法治傳統與自治原則，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與一九八二年憲法進行應有的法解釋⁽³¹⁾。

此外，一九八二年憲法第三十一條除針對香港外，其另一個政治目標的適用即是「台灣問題與和平統一」。然而，歷史上從未有兩個對立的政治體制是以和平手段加以統一。事實上，台灣擁有世界上所有獨立國家的性質與條件；倘若中國無論如何要和平完成統一大業，則首先必須選擇「兩國兩制」，進而是此處所謂的「一國兩制」，而最後才是「一國一制⁽³²⁾」。但基本上，中國根本不可能採取所謂的以基本條約互相承認主權的「兩德模式」或是同時以主權國家方式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兩韓模式」，因為如前言所述，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在聯合國取得代表中國的合法權利，不可能和平地承認台灣或「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³³⁾。因此，中國讓「一國兩制」適用香港的目的，除暫時先繼續維持香港的經濟利益，最後朝向「一國一制」的政治目的外，最主要的目的即是以特別行政區此一地方政府的模式，回收台灣；亦即對中國而言，其對台灣最大的且是唯一的讓步與界限，即台灣放棄與中央人民政府對抗的體制即「中華民國政府體制」，成為一九八二年憲法第三十一條的適用對象。就此點而言，台灣自己本身若要成為一個不與中國對抗的國家，且不論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唯一的選擇不是「在中華民國政府體制下宣布脫離中國的獨立」，就是廢棄中華民國體制直接宣布「台灣共和國獨立」，而若要達成此一目的與獲得最大且最安全的保障，即是以新國家的身分申請加入聯合國⁽³⁴⁾。

參、人權享有的前提——「人民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權力」

其次，在探討中國憲法體制下的形式上的人權規定與實際上的人權保障的現況之前，有必要先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九四九年臨時憲法共同綱領第一條的「人民民主專政」與人民基本權、「無產階級權力與公民基本權」之概念加以釐清，其後再針對以一九八二年憲法為主，視情況酌參一九三六、一九五四、一九七五與一九七八年憲法的人權規定，強調並突顯出形式上的主要的基本人權規定與實際上的人權現況間巨大的差距，證明其人權保障的虛幻性。

一、「人民民主專政與人民基本權」

一九四九年臨時憲法共同綱領第一條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乃是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由工人階級指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促成民主各層階級與國內各民族團結，進行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奮鬥；而其構成總綱之第一章的人民基本權則定位在人民民主專政之下。毛澤東在該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創立二十八週年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紀念論文中指出⁽³⁵⁾，所謂的人民此一概念，必須對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內戰現實加以具體的掌握。亦即，辛亥革命期間的中國人民，在資產階級的指導下，首先提出自然權的普遍性人權之要求；迨至一九二〇年代國共合作期間的中國人民，則是與帝國主義及其背後加以支持的軍閥對抗；至於抗日戰爭的解放區時期，作為權利主體的人民僅限於贊成抗日救國者，與日本合作的漢奸，則必須加以排除。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內戰過程中，當國民黨政權欲以武力奪去解放區所獲致的民主主義體制及其上的人民權利之際，此時的中國人民係指排除國民黨政權此一反動勢力中樞，掌握官僚資本與地主制下的所有人，即與此一反動權力做決定性對抗的人民概念。因此，在此處的人民民主專政論中，毛澤東指出「所謂的人民，在中國現階段即是指工農階級、都市小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而言」。要言之，繼此處一九四九年臨時憲法共同綱領第一條的「人民民主專政」，經過一九五四年憲法再度確認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以來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型態，即由執政黨中國共產黨指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以及在一九七五年與一九七八年的憲法的「無產階級專政」，直到一九八二年憲法中所提示的「四大堅持」首位的「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可知，由當時的國民黨政權到如今依從中華民國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人民，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人民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下，根本不能享有任何的基本權。

二、「無產階級權力與公民基本權」⁽³⁶⁾

此外，造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人權保障規定空洞化的最主要原因是，「政策是法律的靈魂」此一政策優位原則。中國共產黨早先的社會主義革命將中華民國當時既存的法秩序徹底破壞後，並未能有體系性的公佈新的法律，為求彌補此一法律真空狀態只得採取政策優位原則；然而，由於中國的理想社會主義一直都未能實現，因此在形成理想的中國社會主義秩序的運動過程中，一直是採取此種以政治主導下的政策優先於法律的原則，甚至直到今日亦復如此。

中國社會主義法理論對此種政策優先法律的原則所做的解釋是，法律乃是掌握權力的階級意志之表現，反映出統治階級的利益。在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者為求貫徹自己的革命目的，必然須要將此社會力量納入國家型態中，因此國家的法律乃是無產階級者實現階級政策的手段與工具。如此，身為無產階級者前衛黨的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即使並非是國家的法律，但必然發揮指導法律實現方向的作用；換言之，即法律不過是將中國共產黨之政策加以具體化與條文化而已。中國唯有遵照體現無產階級者意志的中國共產黨政策，始符合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本質，才能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任務有所貢獻，亦是工人階級利用來鎮壓敵人保護人民，強化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工具。

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以法律規定基本權的意涵，係與權力的革命目的息息相關，不僅如此其之所以如此正是為求實現革命的目的。既然如此，法律或由法律加以保障的公民基本權，根本就不可能規制無產階級專政權力。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下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權，與其說是對權力的規制，毋寧說是透過權力的擁護，避免遭受反對社會主義革命者的侵害⁽³⁷⁾。

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人權規定與實況

在此以當台灣論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時，較為受到關心的十個項目加以論述。亦即，一般而言較為重視與死刑制度有密切關聯的生命權，如蘇建和案與法務部的廢除死刑制度的政策；與路票有關的居住遷徙及與公安恣意逮捕有關的人身自由權；資本家

與工農階級間關係的法之下平等的權利；與人民民主專政及無產階級獨裁有關的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與竊聽有關的隱私權與通信的自由；與一胎化政策有關的住宅、家庭、名譽與信用；與勞改及法輪功迫害有關的司法手續；與失業人口有關的職業選擇自由與勞動權；與醫療、疾病及衛生有關的社會保障權利；最後是與個人財產、集體財產及國家財產有關的財產所有權的保障。至於關於集體人權(例如少數民族)的部分，由於本研究基於人權保障的核心在於個人尊嚴主義；亦即，唯有在個人人權受到尊重與確保的前提下，始有論及所謂集體人權的必要性，欠缺個人人權保障實效性的前提下，所謂的集體人權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因此不做詳述；但僅管如此附帶一提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鎮壓西藏少數民族的暴行則是舉世皆知的事實。以下即酌參一九三六、一九五四、一九七五與一九七八年憲法的人權規定，針對現行的一九八二年憲法中的十個重要人權規定與人權保障的現況加以論述。

第一在生命權方面，前述所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皆無相關的規定。對於強姦犯與殺人犯的生命權，中國人是極度的漠不關心，在中國從未出現過反對死刑的聲音，普遍認為抑制重大犯罪最好的方法就是死刑。一九八一年六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開決定，除反革命與貪污的案件外，其餘所有的案件，僅須經過最高人民法院的審理，即能允許執行死刑。因此其後的新刑事訴訟法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可隨即停止適用其應審理的所有死刑判決。非僅如此，甚至為求維持社會秩序遏止犯罪，一九八二年八月五名劫機未遂犯的死刑執行是在其失敗後的第四個星期⁽³⁸⁾；此外，一九八三年七月起至十一月間中國所發表的數千個死刑的執行，有好幾個是犯罪後一個星期立即加以執行，甚至有時是在連公開審判或上級審再審理皆無的情況下加以進行⁽³⁹⁾。根據國際反對死刑協會在二〇〇二年六月三十日所發表的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打破一日內執行二〇六名死刑的紀錄；此外，在中國共產黨十六大的前夕十一月上旬，處決四十六名的死刑犯⁽⁴⁰⁾。

第二在居住遷徙與人身自由權方面。在中國國內個人的遷移自由，除負有任務的情況外，在政策上加以限制，即使是自戶籍登記地稍微遷移亦須獲得許可⁽⁴¹⁾。一九五八年以後，居住在農村地區的居民雖可以遷移至都市，但必須取得證明書，證明自己擁有都市人口所必須的技術，但此項政策幾乎無人能加以適用。一九五四年憲法中的選擇居住的自由，被以後的憲法加以刪除。在中國之所以採取針對個人遷移加以限制的政策，基

本上是因為要統制都市空間的缺乏，職業、住宅、糧食的分配所致。關於此點，對於現行的一九八二年憲法中的遷移自由，亦可見到如下的評論，即「關於公民基本權與自由，我們的新（一九八二年的草案）憲法規定，較具現實性。……若可能就保障自由，若不可能就不保障（例如，不保障變更居住地的自由）⁽⁴²⁾」。同時，根據『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二〇〇二年）』指出，中國共產黨將強制遷移一七〇〇〇名的漢族與回族至藏族的聚居地⁽⁴³⁾。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規定的人身自由，經常恣意性的遭受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或政府官僚違法行為的剝奪。人身自由受侵害最顯著的例子，即是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同時，根據『人民日報』（一九八〇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五版），人民公社的何姓職員，以偷盜一頭羊為由，遭其農村生產隊的領導以執行法律的名義，毆打何姓職員，並將其監禁十日，科處罰金五百元人民幣，甚至沒收其部分的財產。再者，根據前述的『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二〇〇二年）』指出，去年一月五日山東濟南時報記者趙京橋等三人，在採訪農村書記涉嫌貪污、欺壓百姓事件時，遭該縣縣委宣傳部與公安強取採訪資料、限制人身自由，甚至在縣委宣傳部遭受公安暴打⁽⁴⁴⁾。

第三在對法之下平等的權利方面，最早期的一九三〇年中國共產黨憲法草案第二條有規定對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工人無差別與平等原則，但卻在第六條要求對軍閥、官僚、地主、榨取的資本家、貴族進行獨裁，並停止其公民及政治權利。再者，儘管一九五四年憲法第八十五條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之前平等」，但一九七五年與一九七八年憲法竟完全消失無蹤，直到現行一九八二年憲法才在第三十三條恢復規定。對此規定仍出現平等的權利應侷限在平等手續上的權利，且不應給予社會主義敵對者平等的政治權利。儘管存在關於平等此一憲法用語主張的不同，但事實上在中國法律一直都是不平等的適用。中國的報紙與法學雜誌經常暴露出有錢人可運用影響力逃避法律的制裁。

第四在思想、良心及宗教自由方面，若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有的文獻紀錄加以調查，即可得知故意地將思想自由排除在憲法應保障的權利項目外，此點若由一九八二年憲法所謂的「四大堅持」的指導思想；亦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與「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觀之，則無須大驚小怪。同時，在與思想自由有著密切關係的言論自由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刑法將某種口頭或書面的表現視為犯罪，任何言論皆不得違背「四大堅

持」，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得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或社會主義制度。一般的行動與言論皆須符合一九八二年憲法第五十一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的廣泛條件；亦即，上述條文所要求的條件是，公民不得損害國家、社會、集團的利益，及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與權利、保障國家的統一、保護國家機密、維護母國的安全、名譽及利益。最顯著的例子即是「北京之春」。根據日本『朝日新聞（二〇〇三年二月十日）』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的高等法院以其在網路中發表鼓吹暴力與恐怖活動為由，認定其觸犯恐怖團體組織罪，判處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再者，一九五四年、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八年與一九八二年四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皆宣示中國公民「享受信教的自由」，但一九七五與一九七八年的憲法則非獎勵信教的自由，而是加上「宣傳無神論」自由的規定；一九八二年憲法第三十六條則將此一規定刪除，但加上「任何宗教事項皆不得受外國勢力的支配」的限制。

第五是隱私權與通信的自由方面。前述四個憲法皆規定有「公民的自由與隱私權……受法律的保護」（一九八二年憲法第四十條）。然而，一九八〇年根據『人民日報』指出，某地方黨書記對郵局施壓，要求其公開對地方黨幹部加以批判者所寫給中央當局的信函、電報與電話紀錄。此外，根據前述的『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二〇〇二年）』指出，政治異議人士呂新華因在互聯網上發表批評中國領導人江澤民的文章，指其具有根深蒂固封建帝王專制思想，因而遭判四年徒刑，罪名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⁴⁵⁾」。

第六是住宅、家庭、名譽與信用方面，前述四個憲法皆規定有住宅不可侵的原則，但實際上卻並非如此。例如，在文化大革命時，住宅經常遭人隨意侵入、掠奪，甚至遭受不法的侵占。其次，在婚姻與家庭上，丈夫與妻子的工作崗位經常分隔數百里甚至是數千里，對結婚與家庭皆形成令人難以承受的重擔，為數不少的夫婦每年僅能相聚一星期左右。奇異的是，從無人根據憲法中關於婚姻的保護，要求在靠近配偶附近的場所工作，因為若如此做，將造成集體利益優先於個人利益的統治價值受到侵害。此外，另一個對家庭造成重大影響者，即是一九八二年憲法第二十五條與第四十九條所認可的限制生育計劃，使夫妻不得養育一個以上的孩子。違反者將遭受批判，工作及其他許許多多的優惠、小孩的教育機會將會受不平等的差別待遇。甚至懷有第三胎的母親將會遭到類似準政府的家庭互助單位對其進行強制墮胎。但同樣地，從未聽見過有根據憲法向這些

政策挑戰的事例存在。

第七是在司法手續方面。一九八二年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對於任何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的違法失職行為，有向有關國家機關提出申訴、控告或者檢舉的權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對於公民的申訴、控告或者檢舉，有關國家機關必須查清事實，負責處理。任何人不得壓制和打擊報復。由於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利而受到損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規定取得賠償的權利」。同時，根據此一憲法，著手修訂刑事訴訟法及其他的法律，將所謂的司法部的獨立、原則上的公開審判、接受辯護與上訴的權利、針對恣意逮捕與拘留的保護等正當的法手續內容納入。然而，實際上的現況與此一憲法與刑事訴訟法等規定的理想相差甚遠。例如，前述的「北京之春」中的反體制主義者遭受表面的審判（如魏京生⁽⁴⁶⁾），甚至是完全未經審判即鋃鐺入獄，或以恣意的行政手續進行勞動再教育，即所謂的勞改⁽⁴⁷⁾。同時，光明正大地無視於新的刑法基準，以新基準以前的逮捕與拘留手續為主，完全不適用新基準。此一政策竟然以法官與律師不足為由加以正當化。若是在緊急必要的情況下，甚至以較過去更為簡略單純的即決手續，進行「維持秩序與安定，打擊犯罪份子」。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即是近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鎮壓法輪功學員事件。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法輪功定位為「邪教」⁽⁴⁸⁾，同時亦以憲法第三十六條所規定的「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為由，設立令人髮指的迫害機關「六一〇辦公室」，進行針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活動。這些迫害活動包括殘酷虐待致死、以電棒電棍的電擊、拳打腳踢、強制打針灌藥，大量秘密判處重刑等等⁽⁴⁹⁾，警察之所以用慘絕人寰的手段，肆無忌憚地進行上述活動，皆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國家主席江澤民對法輪功學員所發的命令，即「打死算自殺、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根據前述的『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二〇〇二年）』指出⁽⁵⁰⁾，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展開鎮壓法輪功以來，被非法逮捕的有十萬多人，被強制送勞動教育與勞動改造或送進精神病院的超過兩萬人，被迫害致死的至少一六〇〇人以上，其中有近四百人的名字可確定。

第八是在職業選擇自由與勞動權方面。前述四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皆宣示所有公民皆享有勞動的權利，但四個憲法亦都排除選擇工作場所與工作種類的權利，甚至規定所有的公民有義務從事由國家所任命的工作。但就實際的例子而言，國家根本

無法提供足夠的工作給予每一位公民，而形成所謂的「下崗（失業）洪水」。根據前述的『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二〇〇二年）』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朱鎔基承認，失業率約有 7%，但外界學者、研究機構與國際社會估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失業率已達 10.4%，失業人口約為一九一二萬人，若加上農村剩餘勞動力，失業人口將達 1.7 億人以上，約佔所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工 7.3 億的 23.3%⁽⁵¹⁾。

第九在社會保障權利方面。由一九八二年第四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的規定可知，社會保障的權利並不完全，此項權利必須受限於國家的能力發展，無庸置疑，不存在所謂公民申訴的憲法權利。同時，在實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 80% 以上從事集體企業與農業的人口從未受過國家的任何保護，其所獲得的生活津貼並非來自國家，大都來自兒童津貼或其所屬的集體工作單位，且僅為國家公務員的極小部分⁽⁵²⁾。

第十在財產所有權的保障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現實上所保障的是社會主義集體的財產與國家所有的財產。亦即，實施所謂的生產資料社會公有制。個人的財產權雖在發生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一九七五年憲法中完全遭到抹煞，但在其他的憲法規定，如一九五四年憲法第八條到第十一條、一九七八年憲法第九條與一九八二年憲法第十三條，皆規定保護「合法所得、儲蓄、房屋及其他合法的財產所有」權利。然而，現實上除前述的失業問題外，另一最嚴重的問題即是貧富懸殊的問題。自一九七九年實施「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政策，此一不均衡的策略雖獲致可觀的經濟發展，但亦擴大貧富差距。根據前述的『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二〇〇二年）』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約 20% 的人控制 80% 的財富，五十個富豪的資產相當於五千萬個農民一年的純收入，而三百萬富翁的資產是全國九億農民兩年的純收入，最富等級的收入是最窮等級的十一倍。同時，農民的平均所得偏低，二〇〇一年農民平均收入為二仟三百六十六元人民幣，其中 40% 為實物收入，現金收入僅有一仟八佰元，扣除購買農用物品後，真正用於消費的僅有一仟五佰元。此外，另有美國學者估算，二〇〇二年每位農民淨所得僅有二佰七十二美元，僅為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然而，居住城市中的居民仍有超過五佰四十萬的窮人，得不到政府任何的幫助，過著赤貧的生活，其每月的收入不到一佰五十二元人民幣（約十八美元）⁽⁵³⁾。對上述的農民與窮人而言，所謂的個人財產所有權的保障，不過是畫餅充飢而已。

伍、結語

綜上所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政體制的形成、發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人權規定、實況觀之，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第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政體制所採取的不論是「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究其實，其所謂的專政即是由中國共產黨進行獨裁，即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國家，建立以黨為主體的國家憲政體制，即台灣過去所熟悉的更徹底的「黨國體制」，否定一切在政治上的反對團體。此種憲政體制表面上只是欲以「無產階級專政」或「人民民主專政」達成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理想為藉口，實際上其目的只不過是為維護統治者的權力，其內容只是為施行專制獨裁而已。

第二是無產階級專政與人民民主專政的結果，只要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人，無論任何人其基本權利皆可完全地加以剝奪。例如，反革命份子或犯罪份子（如魏京生與王炳章等人）。在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台灣人民基本上即是中國共產黨口中與眼中所謂的資本主義下的資本家與地主，亦都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異議份子。因此，對中國共產黨而言，台灣二仟三佰萬的人民若不接納其「一國兩制」的統戰政策，其基本人權不但可完全剝奪⁽⁵⁴⁾，並得以成為隨時以武力解放的對象⁽⁵⁵⁾。

第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人權規定與刑事訴訟法等等與人權息息相關的法律，其位階完全低於政府的政策，其所謂的政府政策只不過是中國共產黨的決策而已，且其政策可隨時修改法律甚至憲法，甚至可以公然的無視兩者的存在，任意地以簡略的手續對人權加以侵害。例如，死刑的執行與法輪功學員的迫害事件。除在公民權的自由權方面極其脆弱外，在勞動、社會保障與財產所有權等社會權的保障方面，亦流於畫餅而已。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存在所謂的違憲審查機制，無論是其人權保障內容規定是多麼的瑰麗堂皇，皆不具任何的現實性與實效性。

由此可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政體制只能成為專制獨裁者的統治工具，並不能真正的保障國民的基本人權⁽⁵⁶⁾。根據兩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後所發表的人權宣言第十六條，一個國家即使有憲政體制，若不能實施權力分立，無法確保人權，就是一個沒有憲法的國家⁽⁵⁷⁾。因此，吾人不得不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乃是一個沒有憲法保障的國家。

註釋：

- (1) 在論述此一題目之前，自然而然就會出現一個疑問；亦即，此處的中國究竟是指中華民國(過去論及憲法的教科書，除明示「中華民國憲法」者，如林紀東(1997)；林紀東(1990)；劉慶瑞(1994)；亦有無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代表的中國區分者，如薩孟武(1990)；傅肅良(1991)；董翔飛(1993)等。)抑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兩者的關係，坊間已有專書加以論述與釐清(目前對此問題做最深入的法理論探討者，首推許慶雄(2001))。本文在此不擬作深入的探討與解析，而直接遵照聯合國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一九七六次全體會議上，所做出的二七五八號決議案(關於聯合國中國代表資格的問題，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間關於中國代表權之爭的問題。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即北京政府成立，遷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喪失對中國本土的實效性支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即要求聯合國否認國民政府代表中國的法地位，導致聯合國中產生究竟是繼續承認由中華民國政府或改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的政府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一九五〇年聯合國大會以三十三對十六(棄權十)，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獲得勝利；然而，到一九六〇年時，贊成支持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的國家已低於反對與棄權國家的總數，一九七〇年聯合國大會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國家已超過聯合國會員國的半數，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的聯合國大會上，以贊成七十六、反對三十五、棄權十七的票數，否認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的代表權，表決通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決議。<http://dic.lycos.co.jp/http://dic.lycos.co.jp/ecp/result.html?query=%91%E4%98p&encoding=shift-jis&id=0009118200>(二〇〇三年元月三十日)(C)Shogakukan Inc.)，即「大會回顧聯合國憲章的原則，考慮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並立即將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and to expel forth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ang Kai-shek from the place which they unlawfully occupy at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 all the organizations related to it.)」，判斷國際社會上的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代表(值得注意的

是，在一九八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序言中提及中華民國。亦即，「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廢除了封建帝制，創立了中華民國」。因此，本文中的中國的憲政體制與人權保障現況，即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政體制及其人權保障的現況而言，與目前尚未宣布獨立的台灣或是現今實效統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憲政體制與人權保障無關。

- (2) 佐藤幸治（1994：13-24；32-38）。
- (3) 松尾直・前田寬（1987：3）。
- (4) 針生誠吉（1969：293）。
- (5) 藤田勇（1969：352）。
- (6) 藤田勇（1969：354）。
- (7) 藤田勇（1969：353）。
- (8) 主要的內容係參照木間正道（1992：60～76）。
- (9) 共同綱領的起草過程，共有三次的起草，可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2003：38-50）；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此一國名，最後是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五日新政治協商籌備會議第四小組開會討論時，由張奚若提出，經討論結果認為，共和國說明中國的國家體制，而「人民」有確定的含意與具體的階級內容，已將人民民主專政的意義表達出，因而不需要用「中華人民民主國」。其實，在共產黨發出新政治協商號召之前，一九四八年一月一八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幾個重要問題」和二月一五日「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草案)」等，皆將新中國定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參照許崇德（2003：52）。
- (10) 關於共同綱領第一條的官方解釋為，第一是所謂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意味著將來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歷史階段；第二是在無產階級主義者的指導下，由各個革命階級進行聯合專政；形成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轉移的客觀條件。
- (11) 新民主主義即等於人民民主主義與人民民主專政的概念與理論基礎，乃是基於毛澤東所提出的論文形成。亦即，一九四〇年一月的「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五年四月的「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中共七期二中全會報告」、一九四九年六月的「關於人民民主專政」。

- (12) 「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五年計劃首度的提出是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到八月一二日，中共中央針對共產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在北京召開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約有一〇〇多人參加，批判財經工作中背離總路線的錯誤。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表「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高山=馮京義=牛寶文，1999：39)。
- (13) 一九五六年九月一五日到二七日，中共在北京舉行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次大會是在社會改造基本上完成，共黨面臨新的形式與任務的情形下召開。毛澤東在會中致「開幕詞」，劉少奇提出「政治報告」，周恩來提出「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報告」等。該大會最後的結論是，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基本上已經建立，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在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雖然尚有階級鬥爭且要繼續強化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體系下保護與發展生產力；最後大會再次強調要堅持民主集中制與集體領導制度(廖蓋隆=趙寶煦=杜青林，1991：1134)。
- (14) 文化大革命亦有其意識形態與理論的背景；亦即，在毛澤東的完全主導下，一九五七年二月提出「兩種矛盾」論，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共第八屆十中全會上決議的「過渡時期階級鬥爭理論」。
- (15) 無須贅言地，此種評價當然是在現行一九八二年憲法成立後始有可能出現，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當然不可能出現。
- (16) 關於此點的政治意涵，根據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葉劍英的修正報告指出，係指打倒四人幫及其所導致的政治對抗與緊張關係的變化。至於究竟為何必須修改一九七五年憲法此一最令人關切的重點，在葉劍英的政治報告中卻完全不提，則令人百思不解。
- (17) 此部憲法亦非完全毫無歷史意義。例如，在此部憲法下，於一九七九年七月 制定刑法、刑事訴訟法等新的法律，對選舉法的大修正等等，進行法體系的整備，發揮一定的轉換期憲法的功能。
- (18) 儘管如此，匈牙利、波蘭、蒙古等國仍是將國家機構一章至於其他條文的前頭。
- (19) 鄧小平（1983：234）。
- (20) 同註 19，478 頁。
- (21) 同註 19，478 頁。
- (22) 草案的第一條與憲法本文的第一條規定相同。
- (23) 根據當時進行修憲報告的彭真指出，既然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涉

- 及統一戰線形成的人民民主專政此一固定方式，「明確地顯示出我國的階級狀況與政權基盤的普遍，清楚地訴說著我國的民主性質」。
- (24) 最早提及此「四大堅持」的是「最高指導者」的鄧小平。
- (25) 樋口陽一＝吉田善明（2001：289）。
- (26) 本文中有關一九八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條文，皆引自人民網網頁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0/2391834.html>（「人民日報」二〇〇四年三月十六日第二版責任編輯為張莉）。
- (27) 許慶雄（1986：238）。
- (28)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趙紫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與瑪格麗特・撒切爾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代表簽字。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中心 <http://www.info.gov.hk/chinfo/maintext.htm>（二〇〇三年元月二十八日）。
- (29) 一九九〇年四月四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表決通過，全文可參照 http://www.info.gov.hk/basic_law/fulltext/c-index.htm
- (30) 董成美編著；西村幸次郎監訳；杉中俊文＝野沢秀樹訳（1984：230）。
- (31) 樋口陽一＝吉田善明（2001：289）。
- (32) 許慶雄，前揭註 27，235 頁。
- (33) 本文投稿後，針對本文進行審查的意見(二)第三點明確地指出，兩岸關係是內戰的結果(此點作者完全同意)，就政治學的觀點，雖可指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是「主權重疊與治權分離」的狀態，但若就國際公法的觀點，既然聯合國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則基於前述的內戰關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僅能淪為「非合法」的叛亂政府的法地位，此點在聯合國與其下的各國國際專門機關中早已確定。至於各國是否真是如此認定，則確實如審查者所言，乃是各國基於國際政治進行政治性極高的政府承認。目前的中南美洲各國政府即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的中央政府，而承認中華民國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但此種情形能繼續多久，不得不令人質疑。乃因國際社會將近二〇〇個國家，僅有不到三十個國家承認中華民國為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兩岸現狀確實是「一個中國」，但卻對中華民國極為不利，因為絕大多數的國家與國際社會認為合法的中央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參照胡慶山，2003：

105~128)。在台灣的選擇方面，誠如審查者所言，有三種可能性：即一、中華民國宣佈獨立成為主權獨立國家（此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亦納入為武力解放台灣的理由之一）；二、成立台灣共和國（此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早已納入為武力解放台灣的理由）；三、兩岸統一改國號為「中國」，共議新憲法或統一法（關於此點涉及兩岸的對等問題，重點在於代表大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有可能與僅統治台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進行「完全對等」的交涉談判，而非如同現狀視其為不服從統治的叛亂地方政府）。此外，基於立憲主義的立場，國家的存在乃在於基本人權的保障，在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仍繼續「人民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權力獨裁」的堅持下，基於形式上及實質上的權力分立、民主選舉與人權保障尚未存在的現況，侈言未來的新憲法或統一法。倘若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真有最大誠意解決兩岸問題，即應基於上述及本文堅持的立憲主義的立場，進行如同舊蘇聯與東歐各國的制憲做法，廢除社會主義政治體制進行實質的立憲主義式的制憲後，在經過一定期間的確認與觀察後，邀請「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加入新憲法，或可和平實現「統一」大業（此種方式恰與西德合併東德方式相反，現今的德國統一後的憲法即是二次大戰結束後制定的西德波昂基本法，東德放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加入西德的立憲主義憲法體制）。當然，在此之前更應尊重即將在「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地區舉行的自主「制、修憲」的結果，不得加以任意的干涉或進行任何的文攻武嚇，以表現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最大誠意。

- (34) 本論文接受審查時，有意見指出加入聯合國真的安全嗎的質疑，誠然在國際政治的觀點下，真正的安全或許完全以實力的觀點加以論述，但本文在此的觀點是以國際法中重要的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承認「個別或集體自衛的固有權利」（上田耕一郎、1997:130~137）。要言之，當台灣以新國家的身分加入聯合國後，即擁有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個別或集體自衛的固有權利」，獲得集體安全保障的權利，而非目前以一對一的方式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武力威脅。
- (35)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制」『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引自古島和雄（1968：403）。
- (36) 論文接受審查時，審查者指出此處的「無產階級權力」應為「無產階級權利」，此乃誤解。乃因此處的「無產階級權力」與所謂的「人民民主專政」具有權力集中制的意涵，乃是政治體制的型態，而非人民的「權利」。

- (37) 對此觀點而言，例如唯有人民民主專政權力，才是中國公民「權利的出發點，亦是加以實現的根本保障」，人民民主專政既然是針對廣大人民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給予嚴厲的獨裁，反革命份子當然不得依此公民的基本權規定，要求相關的權利保障。李光燦（1956：6～8），引自淺井敦（1968：416）。
- (38) Wren, “China Moves,” pp. A1, A22. 引自 R・ランドル・エドワーズ＝ルイス・ヘンキン＝アンドリュー・J・ネイサン、齊藤恵彦＝興梠一郎訳（1990：89,229）。
- (39) Christopher S. Wren (1983：E9).
- (40) 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2002：52）。此份寶貴文獻承蒙中興大學廖宜恩教授提供。
- (41)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禁止農村遷移到都市的理由，可參照 William Parish, (1975: 625-626)引自 R・ランドル・エドワーズ＝ルイス・ヘンキン＝アンドリュー・J・ネイサン、齊藤恵彦＝興梠一郎訳（1990：77，225）。
- (42) 吳家麟（1982：20）。
- (43) 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2002：9）。該報告共舉出七項居住與遷徙自由遭受侵害的事例，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2002：9～10）。
- (44) 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2002：10）。該報告共舉出九項人身自由遭受侵害的事例，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2002：10～11）。
- (45) 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2002：6）。該報告在包括出版、通訊、講學等言論與結社自由方面，共舉出二十八項遭受侵害的事例，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2002：6～9）。
- (46) 由於鄧小平主張張貼「大字報」的自由遭受「魏京生此等極端的個人主義者濫用」，下屆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會上，即將此張貼「大字報」的自由，以引用「禁止侮辱與毀謗公民條項」為由，在一九八〇年時自憲法中刪除(New York Times, 1980:A2)。
- (47) Christopher S. Wren (1982: A1, A 22).
- (48) 一九九六年六月，光明日報率先批判法輪功，接著中國國家出版總署及中宣部下達禁止出版法輪功相關書籍的禁令。一九九七年七月，中國公安部發出「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正式將法輪功定罪為「邪教」（李清如，2001：21）。此份寶貴文獻承蒙台灣大學張清溪教授提供。

- (49) 具體的迫害活動有以下幾種：第一是謀殺與處死（燒死、電擊致死、暴打致死、公安蓄意謀殺、傷害致死、使用刑具致死、灌食併發症致死、拒絕給予醫療致死、在拘留所遭屠殺致死、自高樓推下致死、同一家庭集體致死）；第二是酷刑（殘酷的拷打、即不衛生環境下拷打、利用器具拷打、電擊、懸吊、對身體的傷害、剝奪基本身體需要、以酷熱酷寒的方式拷打、強制灌食）；第三是對女性學員的暴力（強制墮胎、起因於拷打與重勞動的流產、對孕婦及正處哺乳的母親與嬰兒的迫害、對女學員的性侵害與拷打）、精神上的虐待（精神虐待致死、在精神病院的拷打）；第四是對家庭的迫害（強制離婚、強制遷移）；第五是受教育權利的剝奪；第六是對外國人士的暴力(Golden Lotus Press, 2002)。此份寶貴文獻承蒙台灣大學張清溪教授提供。
- (50) 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2002：45）。該報告在打擊法輪功方面，共舉出二十三項遭受侵害的事例，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2002：47～49）。
- (51) 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2002：14）。該報告在工作權問題方面，共舉出六個項目，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2002：17）。
- (52) Parish, Soci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Family,” p. 616.引自 R・ランドル・エドワーズ＝ルイス・ヘンキン＝アンドリュー・J・ネイサン、斉藤恵彦＝興梠一郎訳（1990：98；231）。
- (53) 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2002：14～15）。該報告在財產所有權問題方面，共舉出十九個項目，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2002：19～21）。
- (54) 論文接受審查時，審查者指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論已承認中共黨員搞私有化的資本主義。誠然，中共有此一改革，但並非憲法上的改革而是共產黨內部的改革，基於中國共產黨的獨裁地位不容挑戰，凡不加入共產黨的台灣人民基本上仍無法享有憲法上所保障的基本人權，即使台灣人民加入中國共產黨，不過是受共產黨的保護，仍與憲法保障無關。
- (55) 本文的審查意見(二)第四與五點指出，江澤民的「三個代表理論」，「承認中共黨員的資本家具有合法化，將中共黨員的資本主義化予以合法化。雖然三個代表理論仍具有威權主義色彩，但已可見中共政權的轉形過程」，因此「中共眼中，台灣人民是資本家與地主，為解放對象，則對大陸最近的政情發展有誤解」。筆者所憂慮的

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黨政策高於憲法的實際現況下，所謂的資本家可成為共產黨黨員的「三個代表理論」，若與立憲主義下的結社自由保障比較相差遠矣。亦即，任何人皆可自由地組織各式各樣的政黨；與目前僅在中華民國內政部登記的政黨數目已高達 99 個（葛永光，2002 年）相比，實看不出其尊重台灣二仟三佰萬人民的誠意。誠如，審查者所言「三個代表理論仍具有威權主義色彩」，即在人民民主專政與無產階級權力獨裁下，中國共產黨仍是一黨獨裁黨，其獨裁地位絲毫未改變。

- (56) 本文的審查意見（二）第五點指出，「本文未加上胡錦濤、溫家寶執政後，對憲法的尊重及對人權改進，已比江澤民時代進步的事實，是為美中不足者」。筆者認為人權的保障乃是憲法中最為重要的規定，在違反憲法人權規定的法律無效化的今天，關於憲法人權的學說與判例已日益豐富，人權規定不再僅是形式上的文字規定而已，關於憲法人權規定的研究與探討，已如同民法與刑法等法律化的現象日益明顯，結果是不僅法律文字規定本身有可能違憲，行政機關執法的依據行政命令或處分，當然亦有可能違法或違憲。因此，對近年來早已脫離「人治」色彩的台灣社會而言，當政者「對憲法的尊重及對人權改進」乃是理所當然的要求，但最重要的是扮演司法機關角色的法院是否獨立且是否能基於憲法人權規定宣判違憲的法律無效，此即本文前言中所強調的法治主義。關於此點，中國共產黨的「改進」不過是九牛一毫而已。

- (57) 樋口陽一（1991：90～101）。

參考文獻

- 上田耕一郎（1997）。《集團的自衛權——安保・沖繩問題》。東京：新日本出版社。
- 木間正道（1992）。〈第二部現代中国の法制度第一章憲法および国家制度〉，小口彦太、木間正道、田中信行、国谷知史《中国法入門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aw》，頁 60～76。東京：三省堂。
- 古島和雄（1968）。〈旧中国の人権問題と基本権思想〉，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基本的人権 3 歴史Ⅱ》，頁 381～408。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李光燦（1956）。《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北京：人民出版社。

- 林紀東（1997）。《中華民國憲法釋論》。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
- 林紀東（1990）。《中華民國憲法逐條釋義（一）（二）（三）（四）》。台北：三民書局。
- 松尾直、前田寬（1987）。《憲法と政治の現実》。東京：高文堂出版社。
- 佐藤幸治（1994）。〈權力分立/法治国家〉，樋口陽一編《講座憲法学 5 權力の分立（1）》。
東京：日本評論社，11-23。
- 針生誠吉（1969）。〈人權保障における近代立憲主義型と社会主義型—その原理的試験〉，
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基本的人權 1 総論》，頁 293。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許慶雄（1986）。〈鄧小平体制の改革・開放政策と「一国家二制度」の諸問題〉，日本
近畿大学法学博士論文。
- 許慶雄（2001）。《中華民國如何成為國家》。台北：前衛出版社。
- 吳家麟（1982）。〈論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法學雜誌》，24（4）：20。
- 李清如（2001）。〈法輪功的復興基地在台灣〉，《新新聞》，729：21。
- 胡慶山（2003）。〈台灣的民主化與國家形成之關係——由國際法上的自決權與承認論
之〉，《淡江人文社會學刊》，17：105～128。
- 樋口陽一、吉田善明（2001）。《解説世界憲法集第四版》。東京：三省堂。
- 董翔飛（1993）。《中國憲法與政府》。台北：先鋒打字印刷。
- 董成美編著；西村幸次郎監訳；杉中俊文＝野沢秀樹訳（1984）。《アジア法叢書 5 中国
憲法概論》。東京：成文堂。
- 劉慶瑞（1994）。《中華民國憲法要義》。台北：三民書局。
- 薩孟武（1990）。《中國憲法新論》。台北：三民書局。
- 傅肅良（1991）。《中國憲法論》。台北：三民書局。
- 藤田勇（1969）。〈社会主義社会と基本的人權〉，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基本的人
權 1 総論》。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高山、馮京義、牛寶文主編（1999）。《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年大事記（1949-1999）》。濟
南：山東人民出版社。
- 許崇德（2003）。《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廖蓋隆、趙寶煦、杜青林主編（1991）。《當代中國政治大事典》。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 鄧小平（1983）。《鄧小平文選 1975-1982》。北京：東方書局；北京外文出版社。

- 張 莉 (2004)。《「人民日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文》。取自人民網網頁 <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0/2391834.html>
-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資訊中心 (2003)。取自 <http://www.info.gov.hk/chinfo/maintext.htm>
- 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 (2003)。取自 http://www.info.gov.hk/basic_law/fulltext/c-index.htm
- 淺井敦 (1968)。〈中国社会主义法秩序の形成と公民の基本権〉, 東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基本的人権 3 歴史 II》。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 R・ランドル・エドワーズ=ルイス・ヘンキン=アンドリュー・J・ネイサン、斉藤恵彦=興梠一郎訳 (1990)。《中国の人権——その歴史と思想と現実と——》。東京: 有信堂。
- 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研究小組 (2002)。《中國大陸人權狀況報告 (2002 年)》。台北: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 葛永光 (2002)。〈透析「內政部」政黨法草案〉,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改評論》。取自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IA/091/A-C-091-233.htm>
- 樋口陽一 (1991)。〈フランス革命と世界の立憲主義〉, 深瀬忠一・樋口陽一・吉田克己。《人権宣言と日本--フランス革命 200 年記念》。東京: 勁草書房。
- Golden Lotus Press (2002 Jan. 18). The Falun Gong Report. *New York Times*, pp. A2.
- Parish, W. (1975). Soci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famil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3), 625-626.
- Christopher, W. S. (1983, Nov. 20). Crime and capital punishment in China. *New York Times*, pp. E9.
- Christopher, W. S. (1982, Dec. 5). China moves to resurrect a credible legal system. *New York Times*, pp. A1, A22.